

# 经济评论

## 简 报

2012 年第 2 期

《经济评论》编辑部

2012 年 4 月 10 日

### 编者按

1. 土地往何处去？一个关于土地流转的动态博弈..... 陈珏宇 姚东旻 洪嘉聪
2. 差异化产品价格战的产生和扩散机制分析..... 王皓
3. 威廉姆森的跨学科研究及学术成就的方法论意义..... 刘东 张捷
4. 偏向性技术变迁、习惯形成会如何影响我国经济波动..... 吕朝凤 黄梅波
5. 我国通货膨胀路径中的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 吴吉林
6. 行业间知识溢出与中国产业发展..... 雷欣 陈继勇
7. 产业发展中的本地市场效应：我国产业发展的新路径..... 冯伟 徐康宁
8. 经济波动对城乡居民的间接福利效应差异研究..... 陈太明
9. 创业是否有利于降低失业？..... 董志强 魏下海 张天华
10. 我国劝诱性医疗的成因：管制、市场结构还是信息不对称？..... 刘小鲁
11. 股票价格、实体经济与货币政策研究..... 肖洋 倪玉娟 方舟
12. 货币政策调控住房价格：基于家庭异质性房价预期的解读..... 肖卫国 郑开元 袁威
13. 资本监管、货币政策与商业银行效率非对称效应..... 李勇 王满仓
14. 从就业角度看一味追求顺差的害处..... 陈昊 谢超峰
15. 美元本位与中美货币政策的福利分配..... 何国华 常鑫鑫
16. 财政支出政策的经济影响：国外文献评述..... 张义博
17. 学界对资产价格泡沫的理解程度到底如何？..... 陈国进 颜诚
18. 碳税还是碳交易？..... 李伯涛

### 《经济评论》简介

## 编者按

理论一旦为社会大众所掌握，就能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为充分发挥经济学研究在经世致用、咨政育人、服务实践方面的功能，以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影响社会精英、影响社会民众，我们决定向《光明日报》、《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文摘报刊以及网站经济频道等大众传媒，编辑出版《经济评论》简报。

大体而言，经济类文章不外乎三种类型：(1) 运用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和方法，以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从事经济学专业研究的同行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探索和研究社会经济；(2) 运用经济学理论，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决策者看的文章，目的在于通过影响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思维而改造社会经济；(3) 运用经济学知识，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社会大众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经济生活。《经济评论》简报就是要把第一类（学术论文）转化、简写为第二、第三类文章。凡在《经济评论》上刊发的论文，均由作者改写成1000—1500字的简写稿，以非专业方式表达作者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学术洞察与学术思想。

简报文章以原文为基础而改写，兼顾现实性、学术性和可读性。虽是改写，但我们要求文章自成一体，力求以生动的笔调、浅显的案例娓娓道出作者的学术思想，让非专业读者了解社会经济现象，帮助他们思考经济问题，进而获得思想启迪。因此，简报语言平实生动，说理深入浅出，文章简洁明快，尽量避免专业性很强的理论概念、数理模型及其推演、数据表格、专业注释等。阐述观点、研究结论或提出政策建议时，没有罗列大量数据，但有关键的数据或事实支撑。

学术期刊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大众化和通俗化是理论服务实践的一项积极探索。我们相信，经过学界同仁的辛勤耕耘，《经济评论》简报将成为一个雅俗共赏的精神园地：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有表述的生动性，既有理论的逻辑力量、又有实践的事实力量，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现实的感染力，从而使《经济评论》在注重学术品位、不断提升学术水准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更广泛地服务社会经济建设、服务社会精英和人民群众。

《经济评论》编辑部

## 经济理论探索

### 1. 土地往何处去？一个关于土地流转的动态博弈

陈珏宇（北京大学）、姚东旻（中国人民大学）、洪嘉聪（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政府主导下的土地流转路径模型——一个动态博弈的视角》，《经济评论》  
2012 年第 2 期

在 20 世纪 40 年代或是更早以前，农民转让土地的原因主要是年景不好时的饥荒以及战争，农民为求生存不得已出卖土地，在出卖土地之后，仍会以佃农的身份滞留在农业系统内；而在 20 世纪 50 年代，农民出卖（或离开）土地主要缘于饥荒和破产。这两种情况无一不说明当时农民的贫穷。现如今，农民签订土地契约的目的是为了更富裕，而农民放弃土地的动机往往是进入非农产业以获得更多的收入。他们不再迫于饥饿与贫穷而出卖土地，而是在确定流转土地是否可以增加其收入和消费后，做出自由的选择。

目前，我国土地的流转主要是指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是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在保留土地承包权的条件下，将使用权转让。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方式流转”；“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因此，我国对土地流转方式规定有转包、互换、转让、出租、入股、抵押等。

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农民流转土地后的非农就业的特殊情况，我们试图建立一个政府土地政策与农民土地流转决策的两期动态博弈模型。部分农民流转出土地后，剩下的农民继续与政府博弈，博弈可进行无穷多次。政府制定土地政策，具体包括土地转让价格和土地配给规则。政府希望最大化社会福利，社会福利包括农民种地的总产量，外出打工获得的期望工资总收入。农民生产能力  $\theta$  在  $[0, 1]$  区间有分布函数  $F$ 。通过让生产能力低的农民外出打工并将其土地流转给生产能力更高的农民的方法，政府可以增进社会福利。在土地平均配给规则下，农民自由决定土地流转策略，政府可通过制定土地交易价格，并让所有希望购入土地的农民先申报，再在所有申报的农民中平均配给购买土地的方法实现土地流转，并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在第 0 期，政府给出土地价格，农民决定自己是外出打工还是继续种地。继续种地，则选择是否申报转入土地，申报则所有申报者以政府制定的土地价格平均转入土地。在第 1 期，外出打工得到期望工资，并因为失去土地无法再回到农村。继续种地则得到土地产出收入。因为外出打工者无法回到农村，而且期望工资收入不受农村土地政策影响。政府在剩下的农民中又可以进行一次社会福利最大化，造成新一轮土地流转。这个博弈可以重复无穷多次。

在这个简单的框架下，我们可以证明：政府始终有动机推动土地的整合集中。原因是政府土地政策上的事前有效和事后无效；农村土地有序整合与集中，根本在于农民劳动能力的提高，关键在于政府土地政策推动。由于农民的劳动能力存在差异，为土地流转提供了可能，政府制定合理的土地政策，推动土地整合集中到劳动能力高的农民手中；不同政策、内外因素对土地流转影响主要体现在土地收敛速率上，并不改变土地流转的方向和最终的结果；提出以产量甄别农民劳动能力的方法，改进政府定向采购方式。政府要运用好定向采购办法，有目标地区分农民的劳动能力，并有选择地向劳动能力高的农民配给更多的土地，提高社会福利，在此过程中要考虑到非农劳动力市场的容纳能力。

研究还发现：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加强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让农民的非农经济活动能力增强，有助于农民获得更高的预期收入，降低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促进土地更快的流转；对那些有热情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农民，提高其农业技术，增加务农的收入，刺激该部分农民转入土地增产增收，以达到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加快土地流转率的政策目的；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提高非农经济活动收入，能够刺激更多农业劳动能力相对较低的农民转出土地，进入非农经济领域，有效推动土地整合与集中。

## 2. 差异化产品价格战的产生和扩散机制分析

王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

价格战是现实经济中的有趣现象，也是产业组织理论的古老话题。对于企业来说，采用价格战的方式来争夺更多的市场份额，是一种“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行为。为了避免这种两败俱伤的做法，在很多行业中，企业之间都存在某种有意或无意的默契，以便共同维持一个相对较高的价格，这就是理论上所谓的“价格合谋”。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合谋是厂商之间的合作行为，是理性的厂商为了突破“囚徒困境”而自发地对机会主义行为进行约束的机制，而维持这种机制并不容易。

意外的需求冲击被普遍认为是导致合谋破裂并爆发价格战的主要因素。在这些理论中，观点主要集中于对同质产品进行分析。其主要原因是同质产品的需求函数比较容易刻画，而刻画差异化产品的需求函数则困难得多。而现实生活中，厂商实行产品差异化策略已经非常普遍，在耐用消费品行业中尤其如此。与同质产品相比，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供给、竞争策略、合谋与价格战都体现出新的特征。在需求方面，大多数消费者通常只选择消费一个单位的商品，或者不消费该商品；在供给方面，耐用消费品的差异化特征非常明显，厂商通常推出针对不同消费者的差异化产品，形成了一系列的产品链条，例如轿车分为经济型轿车、中档轿车和豪华轿车；在竞争策略方面，耐用消费品厂商对市场份额极度重视，厂商战略联盟的内部博弈体现出越来越复杂的趋势；在合谋与价格战方面，有时价格战被限定于局部的产品链条，譬如说经济型轿车发生了价格战，但是豪华型轿车仍然处于合谋状态，而有时价格战一旦发生，就会向产品链条的其他部分蔓延。主流的基于需求冲击的价格战理论，包括卡

特尔、默契合谋、衰退时期价格战和繁荣时期价格战，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些现象。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基于产品差异化的模型框架来解释上述现象，并且要求这个模型能够比较容易参数化，从而方便在实证分析中使用。通过引入纵向差异化特征与消费者的“0-1”购买特征，并采用厂商之间的合作系数变量来刻画不同的市场竞争格局，研究完成了这项工作。

对这个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差异化产品，总需求的变化既不能影响已有的均衡市场份额格局，也不会冲击已有的均衡价格体系，而且不会改变合谋厂商的背叛动机。这样，传统基于需求冲击的价格战理论对于差异化产品已不再适用。厂商对市场份额的追求唯有通过改变产品差异化程度来实现。对厂商的合谋稳定性分析表明，差异化产品的合谋集团对背叛厂商的惩罚策略存在着一种“误伤效应”，即合谋集团在惩罚背叛厂商的同时，也伤及合谋集团内部的其他成员。为使这种效应不会导致价格战的蔓延，使价格战局限于产品链条的一部分，每个合谋成员必须对未来收益有更高的耐心，而这种要求并不是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被满足的。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有时价格战与合谋共存，有时局部价格战迅速扩散的现象。

### 3. 威廉姆森的跨学科研究及学术成就的方法论意义

刘东 张捷（南京大学）

《威廉姆森学术成就的方法论成因及其意义——兼论经济学中的跨学科研究》，《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姆森对推动交易费用经济学发展和解释企业边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学术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与将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其他社会学科领域的“输出型”的跨学科研究相比，威廉姆森的跨学科方式则属于“输入型”的跨学科方式。在他那里，经济学不再以社会科学皇冠明珠自居，而是虚心吸取其他社会学科的成果，使得经济学内容有新的突破。

威廉姆森面对“源源而来的”包括纵向兼并在内的各种现实问题，感到仅仅依赖经济学惯用的反垄断理论作答并不令人满意。他认识到科斯交易费用理论可能对研究有所帮助，但是并没有现成的思路指引其深入研究，回答交易费用在什么情况下会有多大，以及企业何时应该兼并。

新古典革命因为将政治要素和社会学从政治经济学中分离出去，而使得契约理论十分贫乏。同时，法学和社会学却在积极响应现实的呼唤，研究和解释已经进化了的契约现象。麦克尼尔从契约演进的观点，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与以往人们熟知的古典契约大相径庭的现代契约观点，并以交易实践为基础，深入刻画其特征，在对不同契约的分类研究中，从纷繁复杂的契约中分离出对应于持续交易的关系型契约，发现并描述出其基本特征。法学与社会学的研究由于深入到契约内部结构和特征，将交易物的现实性、可度量性等影响交易费用的属性揭示于众，这就使得威廉姆森分析影响交易费用关键因素的研究有了依据。

威廉姆森在研究交易的持续性如何增添了履约难度和交易费用时，也遇到困难。因为在经济学中对于理解此类问题，既没有思路也没有方法。社会学和组织理论一向重视程序分析（process analysis）的方式，即重视对事件发生过程进行描述的方法，这对威廉姆森有很大启发。威廉姆森进行“程序分析”的结果，便得到“根本性转变”（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这一概念。在专用性投资后，发生了资产只适应特定交易对象的这一“根本性转变”，使得投资者陷入对于交易对象的依赖。当权力依赖达到一定程度并威胁到交易的持续性和安全性时，通过组织来协调就成为必要。这就完整解释了企业组织的意义和纵向兼并可以节约成本的意义。这一理论也因此成为在解释企业边界决定因素上可操作的理论。

从逻辑链的完整性看，企业组织一体化必要性分析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是人类行为假定。他认为，唯有机会主义假定才能解释经济组织。而这一点有需要以“有限理性”假定为前提。组织行为理论中西蒙的“有限理性”给了他支持，使他完善了行为假定。

威廉姆森从自己的研究经历中深切体会到，经济学必须要与社会学结合，引入他们的研究成果。他甚至呼吁“我们强烈要求社会学家引领我们经济学家注意这些问题，指出这些问题的重大意义，强迫我们经济学家作出回答”。

社会经济现象是复杂的，某一个社会学科难以单独并完善地解释现实。威廉姆森之所以取得公认的学术成就，与他带着问题，在不同领域搜寻并吸取已有学术成果的方法有关。威廉姆森不仅以其学术思想为经济学大厦增添了辉煌，他还以其研究方式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范式。

## 中国经济研究

### 4. 偏向性技术变迁、习惯形成会如何影响我国经济波动

吕朝凤 黄梅波 (厦门大学)

《偏向性技术变迁、习惯形成与中国经济周期特征——基于 RBC 模型的实证分析》，《经济评论》2012 年第 2 期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际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经历了较大幅度的经济波动。实际 GDP 增长率高时可达 14% 左右，低时仅为 4% 左右，对我国经济的健康运行产生了很大冲击。面对此幅度范围的波动，自然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和适合解释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

为了探究上述两个问题，必须深入分析影响我国经济运行的各种机制，如我国实际居民的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技术的变迁过程等。一方面，吕朝凤和黄梅波(2011)通过对我国实际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后，提出：“我国实际居民消费存在明显的习惯形成”。这个观点暗示习惯形成可能会对居民消费的跨期替代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影响实际冲击在居民消费的跨期替代过程中的传导过程。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对我国 GDP 中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发现，我国实际经济表现出明显的偏向性技术变迁。这个观点暗示偏向性技术变迁可能会通过影响劳动报酬份额，从而影响居民就业选择与财富积累。这就表明将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和偏向性技术变迁引入实际经济周期模型来探究我国经济波动是非常必要的。

由此，我们将上述两个思想引入传统实际经济周期模型来解释我国实际经济波动，研究发现：同时引入偏向性技术变迁冲击和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的 RBC 模型能够模拟实际消费、就业、投资和产出的波动幅度；预测消费、投资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预测产出具有明显的自相关性特征，其与实际经济相一致。所以可以得出，该模型能较准确地解释中国 1979-2009 年间实际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特征事实。

利用该模型的模拟结果，还可以回答以下两个极有趣的问题：

一是习惯形成会对我国经济波动产生什么影响？利用模型的模拟结果可以得出：习惯形成的引入降低了技术创新对居民消费、投资的冲击效应。我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了“着力扩大内需”的发展方针。扩大内需的关键是提高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投资水平。因而，需要分析推动居民消费、投资的种种因素，这涉及对中国居民经济行为的探讨。研究表明，在受到相同的技术冲击条件下，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的程度越高，居民消费、投资增加越少；相反，习惯形成的程度越低，居民消费、投资增加越多。习惯形成程度又与实际经济中新产品创新负相关，经济中新产品越多，前期消费过产品在居民消费中所占比例就会越低，习惯形成程度也会越低。故而，为了切实有效执行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我国经济管理部门必须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尤其是新产品的创新。

二是偏向技术变迁会对我国经济波动产生什么影响？利用模型的模拟结果还可以得出：偏向性技术变迁冲击具有明显的就业促进效应。我国1979-2009年间推行以促进资本积累与提高GDP产出、致力于降低我国劳动者报酬份额的偏向性技术变迁工业化发展战略，致使我国社会资本积累、GDP产出与居民消费提高，同时也致使就业水平下降。从增加居民财富、提高资本积累和GDP产出看，这个偏向性技术变迁工业化发展战略是成功的。但进入21世纪后，我国就业问题日益严峻，平均就业增长率从1979-1989年间的3.5%，下降到1990-2009年间的1.3%，尤其是2000-2009年间平均就业增长率下降至0.9%。因此，我国经济管理部门应该高度重视这个偏向性技术变迁工业化发展战略对就业的影响，不能一味追求GDP产出和社会资本存量增加。

综上，我国实际经济波动是由中性技术冲击、劳动供给变动、偏向性技术变迁和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共同作用的复合影响结果，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基本能够合理解释我国实际经济波动。

## 5. 我国通货膨胀路径中的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

吴吉林（山东大学），《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通货膨胀的动态路径发生了显著变化。通货膨胀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结构性变化中，而且在其动态变化中还包含了非线性特征。我国的通货膨胀是否同时存在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如果的确存在这两种特征，那么结构性变化发生的时间点在哪里，在结构性变化前后，通货膨胀的非线性特征是否也发生了变化？不同状态和结构下的我国通货膨胀持久性有何不同？正、负向外来冲击的影响也呈现非对称性吗？另外，我国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间的临界值是多少？这一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我国通货膨胀本质的了解，从而为治理通货膨胀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笔者通过引入 TV-STAR 模型来考察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特征，在统一框架下探索我国通货膨胀中的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研究发现：

首先，我国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转换，其临界水平为 4.091，这种非线性调整具有非对称性，在不同的机制状态下具有不同的调整速度。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期的经济体制转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也相应地经历了转变，这些调整使得我国的通货膨胀的路径在 1994 年下半年至 1995 年上半年间发生了结构性改变，结构性变化后的通货膨胀的波动幅度虽有较大幅度下降，但通货膨胀的持久性明显上升。

其次，在结构变化前的通货膨胀路径中，存在高低两个局部均衡点，分别为 13.985 与 2.949。当初始值  $\pi_{t-3} > 4.091$  时，该模型将收敛于高均衡点；而当初始值  $\pi_{t-3} < 4.091$  时，该模型收敛于低均衡点。一旦通货膨胀的运动处于高通货膨胀机制下，通货膨胀将会在高均衡点附近运动，从而通货膨胀一直会维持在较高水平，这就解释了 1995 年之前持续发生高通货

膨胀的原因。而结构性变化之后的通货膨胀路径中只存在唯一均衡点 4.185,这就意味着 1995 年之后不再会发生持久的高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现象,通货膨胀变得更具有温和性,但持久性比结构变化前要更强。

最后,结构性变化之后,通货膨胀的运动对外部冲击的反应幅度下降,但对冲击的反应速度上升,在某种程度也说明了市场的信息传递效率上升以及宏观调控政策的更加有效性。另外,在不同的机制下,同等程度的正负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在多数情况下,正向冲击要比负向冲击的影响更强、更持久。结构性变化之后,这种冲击的非对称效应也更明显。冲击的非对称效应使得治理通货膨胀的成本要高于治理通货紧缩的成本。

在当前形势下,我国经济又处于高通货膨胀机制下,由于通货膨胀的持久性较强,而且来自石油价格上升、房价泡沫化以及美元快速贬值等压力的不确定性冲击,治理通货膨胀的难度较以往更大。因此,一方面我国要继续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并严厉控制热钱的流入、逐步对人民币升值、扭转贸易顺差局面;另一方面,要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更多地发挥财政政策对结构调整、保障民生、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并逐步降低各种税率,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与投资成本。

## 6. 行业间知识溢出与中国产业发展

雷欣 陈继勇(武汉大学),《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

实现中国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均衡增长的有效途径在于积极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提高工业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引导产业链向高端延伸,又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础和前提。那么,该如何提高中国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呢?众所周知,要提升工业产业的创新能力,一是靠“修炼内功”,即加大产业自身的研发投入和提高产业研发效率,这是增进产业创新能力的基础;二是靠“吸收外力”,即通过学习、交流、贸易等多种形式,吸收其他产业的创新性知识,这是提升产业创新能力的关键。

工业生产的特殊性在于,任何行业必然处于产业链条的某一环节。行业之间通过商品和原材料购销、企业经营与协调、产品技术研发合作以及收益分配等多种渠道,形成内在经济关联机制。当特定行业出现知识创新或技术进步时,会通过上下游行业间的传播渠道,溢出到其他行业,成为推动其他行业知识创新的外部因素。问题在于,任何一个行业在为其他行业输出知识溢出的同时,也从其他行业吸收知识溢出。对特定行业而言,知识溢出的输入和输出往往不是对称的,因此,有的行业可能是知识溢出的净输入方,有的则可能是净输出方。如何识别不同行业在知识溢出链条中的地位(净输出或输入)及其知识溢出的规模,是测度行业间知识溢出的首要难题。

应用基于知识生产函数的贝叶斯空间层级模型,可以有效解决上述难题。该方法不仅能够测度行业间知识溢出的大小,还能够识别不同行业知识溢出效应的符号,从而判断不同行业在知识溢出链条中的地位。基于中国行业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第一,石油加工、炼焦

及核燃料加工业, 化学工业, 金属制品业,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电力、热力的生产供应业, 属于知识溢出净输入行业, 它们从其他行业的知识生产中获益; 第二, 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 纺织业, 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造业, 交通设备制造业, 属于知识溢出净输出行业, 它们为其他行业的知识生产作贡献; 第三, 余下行业在不同年份间知识溢出净输入或净输出的情况不同。

既然不同行业在知识溢出链条中的地位不同, 知识溢出对其知识生产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影 响也不一样, 由此可能对其产业发展也具有不同影响。进一步检验知识溢出与工业产业发展的关系, 对于有针对性地制定产业发展和研发政策, 加快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向现实生产力转换的步伐, 具有重要的实践应用价值。检验结果表明: 中国行业间知识溢出能够显著促进工业产业的发展。据此, 可以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 加快推进机械、石油、化工等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发及创新活动, 提升高新技术产业的知识辐射和扩散效应, 充分发挥高新技术产业对其他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

第二, 资源型产业的知识溢出效应不明显。应加大资源型产业的知识生产投入力度, 以增强其知识生产能力, 提高该产业自身的研发效率, 从而为工业经济整体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 基础性产业是知识溢出主要的净输出方, 因而知识溢出效应发挥最为明显, 是其他产业发展的有利因素。应进一步加大该产业的研发投入, 创新基础产业与其他产业知识流动的渠道, 有效发挥基础性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以提升对工业经济整体发展的积极作用。

## 7. 产业发展中的本地市场效应: 我国产业发展的新路径

冯伟 徐康宁 (东南大学)

《产业发展中的本地市场效应——基于我国 2004-2009 年面板数据的实证》,  
《经济评论》2012 年第 2 期

产业发展需要动力驱动, 在此基础上才能不断形成与实现产业发展的规模升级与结构优化。综观世界各国产业发展的道路选择, 驱动产业发展的动力主要集中于要素供给与市场需求。所谓要素供给主要是通过资源、劳动力等禀赋优势, 以供给条件推动产业发展, 而市场需求则主要借助于市场的力量, 以需求规模引致产业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 我国已渐趋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产业结构, 产业发展质量也在逐步提升。然而, 在此过程中, 我们也应看到我国产业发展主要依赖于低廉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 基本上走的是一条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的产业发展道路。伴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化, 资源环境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 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也将进入刘易斯拐点。可以说, 如果再走传统的以资源耗费、环境污染和劳动力扭曲为特征的要素供给型的产业发展道路, 我国产业发展将难以实现高级化, 或将会被永久地固化为国际分工的“婢女”角色。

令人欣慰的是,在我国产业发展陷入要素供给驱动不足的状况下,改革开放以来所培育出的日渐壮大的市场规模,为产业的深层次发展与可持续性提供了新的动力来源。从市场需求角度来探寻产业发展的新路径,不仅响应了我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所提出的以扩大内需,形成规模化市场需求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号召,而且也符合以克鲁格曼(1980)构建、后经戴维斯和温斯坦恩(1996, 1999, 2003)等学者实证检验的“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论。该理论认为,在一个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和交易成本的世界中,那些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会产生大规模生产和高效率,使本国在满足本土市场需求之外还能增加出口。尽管国外学者已对“本地市场效应”论做了理论与实证的深入研究,但是基于我国产业层面的研究,通过文献梳理可知现有的相关研究缺乏从产业演进与分省细化的视角来透析我国产业发展的内在特征。鉴于这些不足或是遗憾,我们利用我国 2004-2009 年 29 个省区市 22 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以戴维斯和温斯坦恩(1996, 1999, 2003)为分析框架,从全国总体和分省层面检验了我国产业发展中的本地市场效应。

研究发现:我国产业发展中存在着本地市场效应;存在本地市场效应的产业主要集中于我国中东部各省区市;存在本地市场效应的产业主要体现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这些结论对于我国当下及新时期转变产业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首先,对于各级政府机构来说,要突破传统的发展思路,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积极引导和扶持具有本地市场效应的产业,通过产业发展中所蕴藏的市场规模来提升产业发展质量与效益,而对于那些本地市场效应确实不显著的地区,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或路径来支持本地产业的发展,如可通过扩大对外出口的力度或以技术创新强化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等来弥补产业发展的本地市场效应的不足。其次,对于广大企业来说,也要善于发现并勇于投资那些具有本地市场效应的产业,通过本地市场效应来加快企业技术创新的步伐和提升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打破传统的行业发展模式,改变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世界工厂”的身份,逐渐增强产业发展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并努力向国际产业链分工的高端环节进军。

综上,对于当下在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大背景下,在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劳动力数量渐趋减少、抑制投资过热以及周边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显现和欧美发达国家经济陷入疲软的大环境下,我国产业发展亟需要转变其固有的主要依赖于拼劳动、耗时间、费资源的粗放式发展道路,应积极转变到以发挥产业发展所具有的本地市场效应上来。通过借助我国所蕴藏的巨大的市场规模来拉动、提升产业发展的层级及质量,这应是我国应对当前资源环境变化和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大背景下所选择的一条较为可行的发展道路。

## 8.经济波动对城乡居民的间接福利效应差异研究

陈太明(东北财经大学),《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

普通居民既喜欢经济增长又喜欢经济稳定,经济增速下滑会给居民带来福利损失,经济波动也是如此。卢卡斯(1987)率先构建理论模型并用美国数据进行定量研究,发现经济波

动的福利损失很小,经济增速下滑的福利损失却很大,因此政府更应该关注经济增长而非经济波动。这样的结果遭到大量国外学者的质疑,质疑点之一是理论模型假定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相互独立。大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都发现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卢卡斯的估算结果可能存在偏差。

通过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联系的这一传导渠道,经济波动会减缓经济增速进而给居民带来间接的福利损失。卢卡斯(1987)忽略了经济波动的间接福利损失,后续研究只是曾经提及这一点,但却没有构建适当的理论模型对经济波动间接福利损失进行针对性的研究。笔者尝试对卢卡斯基准模型进行拓展,构建能够测度经济波动间接福利损失的理论拓展模型,进而基于理论拓展模型系统量化经济波动给中国居民带来的间接福利损失。另外,中国具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社会特征,各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存在显著差异性,经济波动的情况下城乡异质居民承受的间接福利损失会有所不同。因此,探讨中国经济波动的间接福利损失,不仅需考虑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的联系,还要考虑城乡居民的异质性,这既是对该研究领域新的发展,同时也是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波动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

构建了理论拓展模型之后,笔者采用中国以及省级层面1985-2007年城乡居民消费数据测量中国经济波动给城乡异质居民带来的间接福利损失。结果表明:(1)经济波动通过负面影响经济增速而给居民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间接福利损失,忽略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而得到的结果显著低估了居民承受的实际福利损失。(2)宏观经济波动的间接福利损失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其他相关参数取值相同情况下,在全国层面上,农村居民在宏观经济波动中承受的间接福利损失始终大于城镇居民。具体而言,城镇(农村)经济波动的间接福利损失为0.002585(0.006268)。其经济含义是,经济波动使城镇(农村)居民承受的福利损失相当于降低每一个城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0.26(0.63)个百分点,2007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分别为11855元和3265元,这意味着城乡居民的福利损失等于每年拿走每一个城镇居民30.82元和农村居民20.24元。(3)地区经济波动的间接福利损失也存在一定的城乡差异,当其他相关参数取值相同时,地区经济波动给农村居民带来的间接福利损失倾向于大于城镇居民。(4)采用全国层面数据测度的中国城乡经济波动间接福利损失对应地小于采用省级层面数据量化的所有省份城乡经济波动间接福利损失平均值,这意味着使用全国层面数据得到的间接福利损失低估了城乡居民真正承受的间接福利损失,也表明省级层面样本数据对于系统分析我国宏观经济情况的重要性。

上述研究结果具有重要政策含义:第一,稳定政策的非中性说明政府关注经济波动其实就是在重视经济增长。经济波动通过降低经济增速会间接影响居民福利,从这个层面讲,传统意义上政府用于减缓经济波动幅度的稳定政策变成了一个长期非中性的工具,还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从崭新的视角更肯定了稳定政策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重要性。第二,城乡异质居民的间接福利损失差异表明政府的稳定政策应该具有城乡差异化的特征。经济波动的间接福利损失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以及地区内的城乡差异,这表明通过城乡差异化的稳定政策增进城乡平衡稳定发展并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仍是中国转型期的一大任务。对于中国的

和谐发展,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经济波动不容忽视,政府除重视经济增长之外,还需要关注城乡差异化的经济波动。简言之,为切实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政府应该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要重视保持城乡差异化经济的平稳性,尤其是农村经济的平稳性。

## 9. 创业是否有利于降低失业?

董志强 魏下海(华南师范大学)、张天华(厦门大学)

《创业与失业:难民效应与企业家效应的实证检验》,《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

中共十七大报告曾明确提出“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自此以后,“以创业带动就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加快推进。不过,研究者们更感兴趣的问题是,创业能否带动就业?或者换一个角度问同样的问题,创业是否有利于降低失业?

单从理论上而言,上述问题的答案并不明确。较早时期的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个体总是面临受雇于人、失业和自雇创业三种状态之间的选择,当失业率比较高时,经济中的真实工资水平会下降且获得工作的难度也更大,这导致受雇于人的期望收益下降,自雇创业的预期收益相对变得更高,于是人们就会更多地创业。这种观点将创业视为失业推动的结果,认为创业者大多是被劳动力市场排挤出来的“难民”,他们常常缺乏富有创意的项目,也难以具备经营才能,因此他们的创业活动对失业状况难有改善。这就是所谓的创业的“难民效应”。

较近的一种看法则与上述观点针锋相对,认为创业通常不是由失业推动,而是由经济中的机会所拉动的。失业高涨时人们不会更多地创业,因为高失业常常对应着经济衰退,创业风险变得很高,而且衰退期创业融资也更为困难,结果是创业活动受到抑制。相反,经济景气好转时,商机增多,融资更便利,创业活动变得频繁。此时创业大多是为了寻求和利用新的市场机会,创业者往往也具有足够的人力资本来运作企业,结果这些创业活动将有利于降低随后的失业。这就是所谓创业可以降低失业的“企业家效应”。

不过,最近几年也有人对“企业家效应”假说提出批评。批评意见认为,一个社会根据其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文化状况等,应有一个最优的创业水平;只有当创业水平低于最优水平时,创业才会对经济和就业产生积极作用;若创业水平高于最优水平,创业对经济和就业实际上是有利的(可称之为“过度创业效应”)。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批评说,近年来各国将鼓励创业作为一项重要的发展政策未必见佳,有可能得到糟糕的结果。当然,从直观上我们容易理解最优创业水平的存在:全部都是创业者的社会和全部都是受雇就业者的社会,这两个极端情况同等难以想象,那么很可能存在某个中和了两种极端状态的情形,而它是合理的情形。

从国际上的经验研究来看,既有支持“难民效应”的证据,也有支持“企业家效应”的证据,还有证据支持了“过度创业效应”。这些经验证据与各种理论假说放在一起,我们或许可以总结说:创业是否能降低失业,要取决于两点,一是创业本身是难民型创业还是企业家型创业,

二是一个社会本身的创业水平是偏高了还是偏低了。如果社会的创业主要是企业家型创业，而社会的创业水平总体上又偏低，那么创业活动将对经济和就业产生积极影响，此时鼓励创业和加快推进“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政策才是合理且可行的。

那么，中国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形呢？这需要收集中国的数据展开经验研究来回答。遗憾的是，要获得长时期跨度的创业数据并不容易，因为中国的私营、个体企业发展历史不长，统计数据回溯时间太有限。不过，我们利用私营、个体企业发展较早的广东省 21 个地区 1993-2008 年的数据，检验了自我雇佣创业与失业的关系，结果显著地支持了“企业家效应”，即创业活动带动了随后的就业而降低了失业；而“难民效应”并不明显，换言之广东省的创业活动应主要是市场机会激发的，而不是失业推动的。广东也不存在过度创业的情况，这一点相对容易理解，毕竟我国尤其广东的个人创业从无到有仍未达到一个较高水平，更谈不上超过社会最优的创业水平。这些结论意味着，加快推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在我国尤其广东省现阶段的确是一项合理且可行的政策。

特别地，研究还发现，创业的“企业家效应”随地区发展水平而有所差异，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创业会更大程度降低随后的失业，这与国外一些经验研究结果相吻合。这可能意味着，在经济发达地区积极刺激创业并加快推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将更有成效。

## 10. 我国劝诱性医疗的成因：管制、市场结构还是信息不对称？

刘小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评论》2012 年第 2 期

“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我国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为了控制医疗费用的上涨趋势，我国政府在基本药品、诊断和治疗以及医疗器械使用等方面设置了全面的价格上限管制。然而，从管制的实施结果来看，居民医疗费用的上升趋势不仅未受到明显控制，反而出现了“以药养医”和“以械养医”等过度医疗现象。

对劝诱性医疗现象成因的一个初步的直觉性解释往往是医患间的信息不对称。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在于信息不对称同时存在于事前和事后。由于患者往往都不具备专业医疗知识，因而很难在就医前自行诊断并确定恰当的治疗方式，而就医之后，患者通常也很难判断医生是否夸大了疾病的严重程度。在此背景下，人们自然地倾向于推测医生会利用自身信息优势劝诱患者接受不必要的医疗服务。

然而，如果进一步考虑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和信念推断，那么相比于简单的价格决策，医生的劝诱性行为反而得不偿失。设想如下场景：患者能够感觉到身体的不适，但不确定疾病是否严重。简单起见，假设疾病状态只有严重和不严重两种，而且患者知道自己得重病的概率为 0.5。假设患者为治愈这两种疾病分别愿意支付 300 元和 100 元，则患者就诊愿意接受的医疗价格上限为  $300 \times 0.5 + 100 \times 0.5 = 200$  元。接下来，假设医生分别使用 2 盒药品和 1 盒药品便可以治愈这两种疾病，每盒药品采购价格为 10 元。除药品采购费用外，医生还需承担 10 元的诊断成本，但也可以相应地收取挂号费。如果医生想通过劝诱性医疗行为获利，

那么他将始终宣称患者病情较重, 并使用 2 盒药的治疗方案。患者是否会相信这一诊断结果? 他将观察医生是否能够从药品销售中获利。如果药品零售价格高于药品采购成本, 则理性的患者会质疑医生的诊断结果, 并根据自己对疾病类型的主观信念来决定最高的支付意愿。在此混同均衡下, 患者的支付意愿仍为 200, 即欺骗实际上未增加患者支付意愿, 却使疾病较轻患者的医疗成本增加了 10 元。医生最终的期望利润上限为 170 元。相比而言, 如果医生提供诚实的医疗服务, 则能够节省这一不必要的医疗成本。在此分离均衡下, 为使患者相信诊断结果是真实的, 医生须将药品零售价格设定为采购成本价, 以使诚实医疗的承诺可置信。在此基础上, 通过设定挂号费为  $90 \times 0.5 + 280 \times 0.5 = 185$  元, 医生可以获得期望利润为 175 元。

从以上分析可以推断, 医生有动力通过自发的价格承诺来向患者提供诚实的服务。但是, 价格上限管制的实施可能会使市场自发的价格承诺机制失效。在我国医疗价格管制实践中, 医疗服务价格的上限管制使得公立医院在该项目下的收入长期低于相应成本。在此背景下, 如果医生仍试图以药品定价来实施承诺, 则他会遭受亏损, 而提高药品价格则带来了药品销售的利润空间, 进而导致患者的信念修正和对医生的不信任。这使得医生的行为可能转向欺骗性的劝诱性医疗, 从而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和患者过度用药所可能承受的健康风险。从政策实施的最终结果来看, 管制并没有改善患者福利, 反而引起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

在公立医院行政性垄断势力的影响下, 对药品和医疗服务的全面价格管制会强化过度医疗所导致的效率损失。在之前的例子中, 如果政府只规定挂号费用不能超过 10 元, 那么在劝诱性均衡下, 医生可以将挂号费定为 0, 并为所有患者都提供 2 盒药的治疗方式, 且每盒药品零售单价设定为 100 元。但如果政府进一步规定药品零售价格最高不能超过 20 元, 则医生为强化自身垄断抽租能力, 均衡时会设定挂号费为 5 元, 并以 20 元的价格为患者开出 8.5 盒药品。

上述研究表明, 医患间的信息不对称并不是导致医疗费用高昂的主要原因, 因为患者的信念修正会消除劝诱性医疗的诱导效果, 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才是导致患者承担高昂医疗费用的根本原因。我国的医疗价格管制政策并未改变公立医院的地位, 因而无法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上涨, 反而导致了医疗资源配置上的效率损失。

## 11. 股票价格、实体经济与货币政策研究

肖洋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倪玉娟 (海通证券研究所)、方舟 (厦门大学),  
《经济评论》2012 年第 2 期

20 世纪以来, 历次股票市场的暴涨暴跌都对实体经济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货币政策相互作用。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向量自回归方法, 我们对 1997 年 1 月至 2011 年 6 月我国股票价格、GDP、通货膨胀率和利率及货币供应量进行了实证分析, 得到如下结论:

其一，中国股票市场影响着实体经济的发展。首先，股票市场的变化影响通货膨胀率。股票价格的上升会导致物价水平的上涨，从而会对货币政策稳定物价的这一最终目标提出挑战。具体来说，股票价格上升推动物价水平上涨的主要机制表现为：首先股票价格上涨通过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和托宾 Q 效应等渠道促进消费与投资水平的增长，从而拉动总需求，进而使物价处于较高的水平。而这可能进一步导致通货膨胀预期增加。同时也说明了金融市场对商品市场的替代效应没有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和托宾 Q 效应明显（郑鸣、倪玉娟，2010）。其次，股票价格也影响着 GDP。短期来看，股票价格的上升会导致 GDP 的下降，但从长期来看，股票价格的上升会导致 GDP 的上升，这主要是由于在短期内，股票市场的替代效应超过了财富效应和投资效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和投资效应占主导地位，这与吕江林（2005）的结论是一致的。股票价格波动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而股票价格过度波动则也可能会严重影响宏观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所以，我国的货币政策应当对股票价格的波动作出反应，以避免其对宏观经济的不利影响。

其二，中国的货币政策工具（利率和货币供应量）对股票价格的政策效力均不强，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利率变动导致货币供应量发生变化，同时也对股票价格产生影响。而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影响着通货膨胀，也一定程度影响利率和股票价格。但进一步地，通过广义脉冲响应发现，中国人民银行紧缩性（宽松性）的利率政策并不能抑制（推动）股票价格上升。增加（减少）货币供给短期内能够推动股市上涨（下降），但长期对股市仍没有效果。通过方差分解，本文还发现利率对股市变动的贡献度较货币供给、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要大。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更加完善和市场化程度提高，货币政策通过股票价格进行传导的机制越来越重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需要关注股票价格对宏观实体经济尤其是通货膨胀的冲击。但是，由于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仍不能有效地调控股票市场，应将股票价格纳入货币政策调控的辅助监测体系中。国内外的历史证明，股票价格泡沫的形成与破灭对宏观实体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关注股票价格也是货币政策自身目标实现的需要。对股票价格波动是否进行有效调控的判断应该以它是否损害实体经济为标准。同时货币政策对股票价格的调控，应主要针对由非经济基本面引起股票价格过度波动的部分。因此，中国人民银行还需要深入研究金融资产合理定价，区分股票价格波动是基于基本面波动还是存在泡沫因素，构建一整套股票价格波动的判断标准和评估机制，以分析股票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程度，进而采取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对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进行必要的调控。

从货币政策操作的具体操作实践看，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仍然以货币供应量作为其中介目标（赵进文、高辉，2009）。随着货币乘数、货币流动速度的不稳定和金融市场发展带来的资金结构的变化，已经影响到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和可测性。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效力越来越不显著，相反利率政策则可能越来越显著，同时货币市场与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为利率政策进一步发挥作用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我国应在

风险可控的状况下，加快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加强利率对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调节功能。

## 12. 货币政策调控住房价格：基于家庭异质性房价预期的解读

肖卫国 郑开元 袁威（武汉大学）

《住房价格、消费与中国货币政策最优选择：基于异质性房价预期视角》，《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

近十年来，房价持续高涨始终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未解的难题。目前，学术界已从多个角度探讨了货币政策调控住房价格出现困局的原因，例如房地产行业供需失衡、土地供给制度缺陷、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房地产信贷监管缺位和流动性快速扩张等。这些观点均存在各自的合理性，但都停留在宏观制度层面，假定这些宏观制度层面因素均能得到完善，中国人民银行也会像发达国家央行一样面临如何调控住房价格的难题。因此，转至微观层面，探讨家庭决策行为对货币政策调控住房价格的影响或许能够解开这一难题。

住房具有消费品和投资品双重属性，因而能够影响到家庭的消费与投资决策。一方面，住房价格波动通过改变家庭的房价预期来影响家庭投资决策。另一方面，住房价格波动通过改变家庭资产负债表状况来影响家庭的消费决策。由于不同家庭在所处生命周期、财富规模、收入水平和风险偏好等方面存在差异，不同家庭的房价预期呈现出异质性特征，即部分家庭持上涨预期而部分家庭持下跌预期。持上涨预期的家庭并不会延迟消费和经过长时间的资金积累来完成购房，并且在信贷约束条件下尽可能多地通过借款来购房，最大借款额度取决于贷款人对住房抵押价值的评估，因而住房价格波动对这部分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和消费会产生放大影响。持下跌预期的家庭会减少住房资产的持有和增加储蓄以在房价下跌时购房或平滑未来的消费水平，因而住房价格波动对这部分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和消费不会产生放大影响。总体而言，住房价格波动对家庭资产负债表和消费的影响程度就取决于持上涨预期家庭与持下跌预期家庭的占比情况。

考虑到家庭异质性房价预期和信贷约束，我们通过构建一般均衡模型论证了住房价格对持不同房价预期家庭的消费的影响，并模拟分析了住房价格、消费与货币政策选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当持房价上涨预期的家庭越多时，住房价格波动对消费波动的影响越大；（2）持房价上涨预期的家庭在购房时借款越多，住房价格波动对消费波动的正向放大效应越强。但来自实际数据的实证结果并不支持这种放大效应，可能的解释是当前房价已超出多数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大多数家庭在购房时透支了未来的消费能力；（3）盯住住房价格的货币政策获益很少，其在减少产出波动的同时增加了通胀波动。

基于上述结论，我们的政策建议是：为了降低消费波动、提高消费占产出的比重，以及防范调控住房价格的紧缩货币政策可能导致的经济硬着陆风险，中国应遏制住房价格偏离均衡的上涨尤其是房价上涨预期，但货币政策不宜盯住住房价格。

### 13. 资本监管、货币政策与商业银行效率非对称效应

李勇 王满仓 (西北大学), 《经济评论》2012 年第 2 期

1996 年以来, 我国的货币政策逐步步入规范化、法制化和市场化的阶段, 我国对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逐步增强。尤其是正式加入巴塞尔协议以来, 我国金融监管实现了从金融稽核过渡到以防范金融风险为核心的审慎性监管。自此以后, 我国在金融监管上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 (包括降低坏账率、风险资产分级管理等措施) 有力地促进了商业银行的发展。截至 2010 年年底, 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为 94.3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9.7%。其中,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总额 45.9 万亿元, 增长 14.4%, 其份额将近到银行总资产的 50%; 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资产总额 22.8 万亿元, 增长 32.1%; 其他类金融机构资产总额 25.7 万亿元, 增长 21%, 两者的份额各占 25%, 银行业总体改革和发展业绩卓著。

很显然, 在一系列银行业改革措施出台之后, 我国商业银行实现了稳健的发展, 商业银行的运行效率得到了稳步的提高, 并为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么, 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便是: 以降低坏账率、加强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金融监管政策是否起到了改进商业银行运行效率的作用? 另外, 自 2008 年以来, 随着我国准备金率不断提高, 这对商业银行的运行效率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需要找到合适的变量来反映商业银行的运行效率, 而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无疑提供了非常重要借鉴意义。那么, 紧接着下来的问题便是资本监管、货币政策以及坏账率与商业银行的利润、成本效率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 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同时还会为今后的货币政策走向和审慎监管政策提供极其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

基于上述背景, Li 和 Wang (2012) 通过 Kopecky 和 Vanhoose (2004) 证明: 坏账率与商业银行利润效率成反比, 法定准备金率和资本充足率与商业银行利润效率呈现出非线性关系, 而法定准备金率和资本充足率对于商业银行利润、成本效率的影响存在着差异, 即非对称效应。然而上述结论还缺乏内生机制以及实证检验的支撑, 我们则从这两个方面进行了努力。研究结论认为: 利润创造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构成了非线性关系的基础, 资本充足率和准备金率虽然抑制了银行风险, 但同时也缩小了银行的可贷资金规模 (利润创造能力减小); 而非线性关系的存在得益于准备金率对于成本和利润的不同影响。进一步, 为了验证非线性关系和非对称效应的存在性, 我们利用近年来发展的面板门限回归技术进行了验证, 实证结论表明: 坏账率对于商业银行成本、利润效率的影响为负; 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分别处于 7%~11% 和 5.4%~7.8% 时, 资本充足率对于商业银行成本、利润效率将会产生正向影响, 继续提高则意义不大。

上述结论的政策导向也十分明显: 由于不良贷款率对于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为负, 那么严格控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对于商业银行效率的提升是必要的。而资本充足率、准备金率对与商业银行效率的非线性关系说明单纯依靠资本充足率、准备金率来提升银行效率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另外更为重要的是, 资本充足率、准备金率对于商业银行的成本、利润效

率存在着非对称效应。那么,对于商业银行非对称效应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关于内生机制的解释表明资本充足率、准备金率的提高是否能够对商业银行效率产生积极的作用,关键取决于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提高后银行的贷款质量、运营风险是否能够得到相应的改善并足以弥补因为可贷资金减少所引起的机会成本增加,而这与商业银行自身监管措施的完善和良好的微观、宏观环境以及信用水平是分不开的(即资本充足率、坏账率的变动是否能够引起商业银行的良性互动)。因此,完善商业银行的微观机制、提高商业银行管理水平是提高商业银行效率的必由之路。

#### 14.从就业角度看一味追求顺差的害处

陈昊 谢超峰(北京师范大学)

《外贸顺差、贸易筛选与就业关系研究——基于月度数据的再检验》,《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

顺差规模扩大带来的不利影响,已经为政府和绝大多数学者所明确。许多人支持保持高水平外贸顺差的最后一点理由,往往是顺差带来良好的就业。可是即使从就业的角度来看,顺差的就业提高效用或许也被夸大了。理论上存在两个问题是许多人容易忽略的:第一,出口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因此出口贸易增加会提高就业,这是一种普遍的逻辑,可是贸易筛选机制却被人忽略。一旦企业要提高出口产品的生产,或者一国要增加一些参与出口的企业,客观上就形成了对劳动力更高的素质要求,企业招聘者会更加重视通过各种筛选方式来尽可能保证所招聘的员工具备国际化素质。与此同时,素质是不容易短期内得到提高的,因而贸易筛选的最终结果往往是降低就业。既然存在这种相反的影响机制,过于武断地提出出口贸易增加就业的结论是不够可靠的;第二,即使我们暂且认可出口贸易提高就业这个结论的正确性,但是进口贸易的就业效应却是让人难以捉摸的。迄今为止的研究还没有给出让人信服的进口贸易就业效应的机制和实证结果,既然进口贸易的就业效应并不确定,那么顺差的就业效应自然值得重新探讨。

问题的关键在于,贸易筛选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明勒和瑞特(1998)通过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就业市场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出口开放度的增加会显著促进就业的增长,而与此同时雷琴科(2004)对美国各州出口与就业的关系研究则证明就业增加会显著提高出口水平,但是出口的增加却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当然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赫尔普曼等(2009; 2010; 2011)的持续性研究工作。他们通过研究贸易与劳动力市场产出的关系,甚至非常肯定地指出贸易会增加失业,换言之贸易会减少就业。张华初等(2004)从对外贸易类型角度研究出口贸易与就业的关系,认为加工贸易的发展及加工贸易出口水平的提高会大幅度增加就业。毛日昇(2009)指出出口对制造业就业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即如果考虑产出规模、生产效率和劳动需求弹性三个不同层面,出口增加对不同制造业会带来不同的就业效应。陈昊(2011)指出出口增加未必能够提高就业水平,因为进口对就业的减

少有可能显著抵消出口的就业效应甚至产生逆转，因而顺差对就业的影响可能并不显著。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角度研究得出如此差别巨大的结论，这本身就表明了对贸易筛选机制的研究还并不深入。

应用卡尔曼滤波的回归方法进行研究的好处在于，可以比较轻松地摆脱内生性的纠缠，专注于递归算子模拟对外贸易就业效应的过程，虽然这同时也带来了回归结果未必准确的风险，但是影响方向依然是值得信任的。研究发现，出口贸易的增加确实带来了持续性的就业水平提高，但是顺差的提高对就业水平却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效果。更有趣的是，可以通过卡尔曼滤波估计大概在顺差超过 15000 亿美元后，顺差对就业的抑制作用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换言之，并不是不要顺差，而是要将顺差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赫尔普曼等提出的“贸易筛选”机制，实际上是基于搜寻匹配模型的开放背景研究，其中企业异质性是默认的前提。就中国现在的经济环境而言，考察对外贸易对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就业水平的影响路径与程度，本质上是在考察作为微观个体的企业和劳动者是否能够在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最优化活动。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企业面临的备选战略将会越来越多，匹配和筛选的成本就会越大，这就有可能导致对外贸易对就业水平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因而出现本文所得出的结果也并不奇怪。

总之，不应简单地将扩大出口规模作为促进就业的长期有效方法，这一点已经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应该在进一步提高出口规模和质量的基础上，争取进口国内市场偏好的先进产品或原料，以及国内经济建设急需的先进技术设备，这样一方面可以将外贸顺差的规模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尽可能减小贸易筛选机制对我国就业水平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岗位。

## 15. 美元本位与中美货币政策的福利分配——基于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视角

何国华 常鑫鑫（武汉大学），《经济评论》2012 年第 2 期

美国从 20 世纪中后期开始不断采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源源不断的美元被印刷出来，大量购买世界其他国家的商品。早期，以中国为代表的出口国非常满意这种外向型的发展模式，贸易顺差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加。但是，美元的持续贬值以及美国的债务危机让中国人开始明白用产品换回来的美元正在逐渐丧失购买力。毫无疑问，在美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中，美国居民通过大量购买其他国家的廉价商品获得了更多福利。所谓福利，也就是普通民众可以通过更少的劳动换取更多的消费品。为了抵御美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中国为代表的外围国家试图通过资本管制等各种措施来减小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但效果不佳。这让中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开始探究其中的原因，“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关注的焦点。那么，中国是否也能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来获得更多的福利呢？美元本位到底如何影响中美两国货币政策的福利分配？

麦金龙（McKinnon）把美元在国际贸易标价、国际结算和外汇储备中处于绝对优势的

现存货币体系称为“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在美元本位下，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采用美元标价，但是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却不采用人民币而仍然是美元标价，导致出口商品货币标价的不对称性。当人民币汇率出现波动时，短期内中国出口到美国市场上商品的价格没有发生变化，因人民币汇率波动出现的损失由中国出口厂商承担。但是，美国出口到中国市场上商品的价格会随汇率发生变动，不会因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而给美国出口厂商带来汇率风险。出口商品货币标价的不对称性最后导致汇率风险承担的不对称性。当美国采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时，其给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可以通过汇率变动完全传递给贸易伙伴，从而在增加美国产出的同时减小美国宏观经济波动，使得美国居民的福利水平增加。然而，当中国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时，无法通过汇率变动充分有效地传递到美国市场，只能由经济内部来消除政策给宏观经济带来的经济冲击。美元本位对中国经济影响的程度越深，中国市场对经济冲击带来的负面效果就承担得越多，中国居民获得的福利就越少。通俗地讲，在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可以让贸易伙伴国帮其承担经济波动的不利影响，却不帮或者较少帮助贸易伙伴国承担经济波动的不利影响，因此美国居民总能获得更多的福利分配。

为了扭转中国在和美国贸易中的吃亏局面，中国应该坚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让更多的出口厂商采用人民币来进行标价和结算，降低美元本位的影响。近几年来，人民币在周边地区的流通范围越来越广，许多国家愿意直接采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人民币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元、欧元、日元最重要的外国货币，在中国云南等边境地区，人民币被冠以“小美元”之称。中国应该充分利用人民币国际化这一趋势，制定各种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措施，鼓励直接用人民币进行对外投资，按照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国际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三步走的策略，逐步实现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同时，完善人民币的国际金融市场，拓宽海外人民币的投资渠道。除此之外，还应该加强国内出口厂商之间的合作，提高对外的议价能力，避免国内厂商之间的恶性竞争。当然，在短期内，中国还应该积极参与中美国际货币政策的合作，最大程度地减少美元本位带来的不利影响。

## 理论前沿动态

### 16. 财政支出政策的经济影响：国外文献评述

张义博（北京大学）

《财政支出及其结构的经济效应：国外研究评述》，《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货币政策有限的调节作用促使各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财政政策的重要作用，并相继出台了各种财政刺激方案以缓解经济形势的恶化。虽然中国也遭受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使中国经济表现一枝独秀。然而，财政支出政策的实际经济效果如何，国内外学者并没有达成一致共识。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更加偏好货币政策，就是出于对财政政策效果的质疑，尤其是理性预期和货币主义等自由主义学派更是反对财政支出政策引发的经济干预。即使在中国，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带来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很多学者也开始关注财政支出政策的不利影响，例如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内需不足等问题。

关于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巴罗（Barro, 1990）较早地探讨了财政支出及其各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发现经济增长率与政府生产性支出所占比例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随后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大都认为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是非单调关系，即财政支出的增加既可能带来经济增长率上升，也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关键取决于政府融资模式（税收和发债）、政府支出规模、利率水平、税收结构和生产技术特征等。

关于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一种是负财富效应说。该理论认为消费者对当前可支配收入不敏感，会根据一生可能获得的总收入进行平滑消费。若政府增加财政支出，肯定需要通过征税来为支出融资。对于个人而言，这意味着收入的减少，因此他会选择减少消费。佩罗蒂（Perotti, 2007）总结了另外一种相反的情形，认为财政支出扩张会带来额外的劳动需求增加，继而会使得工资增加。当工资增加时，消费者的当期收入就会增加。此时消费者对当前可支配收入是敏感的，因此当期收入的增加会促使他们增加消费。同时，现实数据告诉我们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复杂的，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财政支出的各子项目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关于财政支出与私人投资。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当政府支出增加时，很可能会扩大预算赤字，并通过发行债务为财政支出融资，这会引发利率上升或与私人部门竞争有限的可获得资金，从而挤出私人投资。此外，政府部门就业或雇员工资增加会使其就业岗位更具吸引力，这会迫使私人部门提高工资，最终私人部门利润和投资均会下降。另外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财政支出政策的可预测性和可信性能够树立投资者的信心，还会带动国内需求。此外，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能降低私人投资的成本，这些都将有利于私人投资。显然，财政支出与私人投资的关系取决于上述两种作用力大小的比较。

关于财政支出与收入分配。财政支出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具有多样性，其中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对就业市场的影响。财政支出中的政府雇员工资变化会影响公共就业岗位供给，这会引发公私部门间收入差异的变化。另外一个主要表现是财政支出的阶层效应，政府一般通过转移支付手段改善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但既得利益集团可能会干扰正常的转移支付方向，从而恶化收入分配状况。总的来说，现有研究认为财政支出政策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往往通过教育、健康、政治体制、就业机会等因素来实现。

根据对已有研究的梳理可以明显发现，财政支出政策的经济影响是复杂的，不同情形下的结论甚至是冲突的。其政策启示在于政府在实施财政支出政策时，必须根据现实经济情况和经济形势的变化，精准地把握财政支出政策经济影响的变动方向，做到趋利避害，真正发挥财政支出政策的积极作用。为此，政府除了收集尽可能准确的经济信息，掌握科学的经济预测方法之外，还要减少对经济主体的经济扭曲，使经济政策的传导途径通畅有效。

## 17. 学界对资产价格泡沫的理解程度到底如何？

陈国进 颜诚（厦门大学）

《资产价格泡沫研究述评：实验金融学视角》，《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

资产价格泡沫可以追溯到荷兰郁金香泡沫(1643-1647)、密西西比泡沫(1719-1720)、南海泡沫(1720)等，长期以来一直是经济学家重点关注的对象。近年来，资产价格泡沫在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包括中国。2007年7月，美国次级债危机(subprime crisis)突然爆发，全世界陷入了自30年代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随着全球经济增长下滑，如何刻画资产泡沫再次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可是，学界对资产价格泡沫的理解程度到底如何呢？

到目前为止，资产价格泡沫方面的文献主要可以分成以下四类：第一类为信息对称理性泡沫(rational bubbles under symmetric information)，假设所有投资者具有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并掌握着相同数量和质量的信息，先根据泡沫膨胀特征设定一个爆炸性过程，再通过检验资产价格是否符合这一过程来验证泡沫的存在性。第二类为信息不对称理性泡沫(rational bubbles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这类模型在前一类模型基础上放松了信息对称假设，由于并非所有人都知晓泡沫的存在与否，使得泡沫可以在更一般的条件下产生。第三类模型为有限套利泡沫(bubbles due to limited arbitrage)，这类模型将投资者分成理性交易者和非理性交易者(行为交易者)，理性交易者知道资产的真实价值，在为自身利益套利的同时消除泡沫的存在：在资产价格超过价值的时候卖空，在资产价格低于价值的时候做多。但是，现实中各种套利限制(市场不完全、禁止卖空、资金不足等)使得理性交易者无法做到完全套利，从而无法完全消除行为交易者对价格的影响，泡沫得以持续。第四类模型为异质信念泡沫(heterogeneous beliefs bubbles)，即由于潜在的心理差异，投资者对相同资产的基本价值的先验或后验的判断并不相同，各自基于自己的判断进行卖空或者做多交易，这类模型

将泡沫的产生归因于异质性信念。

前两类研究都是在传统理性预期框架下展开，仅在信息对称与否的假设上存在差异，因此文献往往将这类研究中的泡沫称为理性泡沫。从这种意义上说，是否假设经济主体行为理性和预期理性是资产泡沫研究的分界点。后两类研究要么引入了非理性的行为交易者，要么引入了异质信念，往往会被认为是非理性泡沫。

最新的研究方向来自于行为金融学和实验金融学。行为金融学对泡沫的解释比异质信念更进了一步，直接分析人类的心理变化对资产价格的影响。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无法对这类理论进行实证检验。而实验金融的出现弥补了这一不足，为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实验室实验的优势在于具有对市场参与者和实验环境设计的灵活性，通过可重复实验将实证中无法观测的变量变成可控的实验变量。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泡沫的实验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结论表明泡沫产生可能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简单排除任何一种因素都无法阻止泡沫的产生。

总之，资产价格泡沫领域的文献数量在过去三十年中飞速增长，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金融理论。然而，许多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举例来说，没有几个有说服力的模型能解释泡沫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和为什么开始的。还有，多数模型假设泡沫在一瞬间破裂，而现实中泡沫常会经过几周或者几个月慢慢消失。虽然我们更好地理解理性投资者为什么不能完全消除由行为投资者带来的定价偏差，但是对行为偏差和信念扭曲产生的原因理解还不多。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将可能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18.碳税还是碳交易？

李伯涛（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碳定价的政策工具选择争论：一个文献综述》，《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

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会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重大挑战。目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已从工业化之前的280ppm上升到380ppm。一般认为，如果二氧化碳浓度达到700ppm或更高时，将会给人类带来极端的灾难。因此，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对人类的福利是非常重要的。

碳排放既可根据庇古的观点视为负外部性问题，也可根据科斯的观点视为公共品问题，即不完全产权问题（Stavin, 2011）。这类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缺乏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定价机制。由于缺少价格信号的引导，市场机制在解决这类问题上便无法充分发挥作用，所以需要政府采取行动以减少排放。政府用来给碳排放进行定价的政策工具主要有三种：一种是传统型的命令与控制工具（command-and-control instrument），这种规制措施要求使用最佳实用技术或其他特殊的技术指令。命令与控制工具实际上是对外部性进行隐性定价。二是价格型工具，即征收碳税(carbon tax)。碳税是一种庇古税，是对外部性进行直接定价。三是数量型工具，即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cap-and-trade system）。总量控制和交易制度是指政

府确定一定时期内碳的排放总量,再对排放权进行初始分配,然后由企业在排放权交易市场上进行排放权的自由交易,最终确定排放权的价格,对外部性进行定价。

在以上三种控制碳排放的政策工具当中,命令和控制工具的使用由于经济成本过高,不为经济学家们所推崇。经济学家一般主张采用基于市场机制的价格型或数量型的碳定价政策,并由此形成了支持价格型工具的碳税派和支持数量型工具的碳交易派。综合已有的研究,两种政策工具在使用上实际各有其优劣性。碳税的主要优势是具有经济效率,并能减少规制者寻租的机会。根据 Weitzman (1974) 的研究结论,在减排的边际成本不确定时,两种工具哪一种更有效率取决于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曲线的相对斜率。如果减排的边际收益曲线比边际成本曲线更平坦,税收将比数量限额更有效率,反之则反是。由于温室气体减排的边际成本是流量(减排量)的函数,而减排的边际收益是存量的函数,减排的边际收益在短期内不会快速改变,所以温室气体减排的边际收益曲线相对于边际成本曲线更平坦,在减排上税收手段更有效率。另外,碳税和碳交易相比,也降低了规制者寻租的机会(Nordhaus, 2006, 2007)。因为在可交易排放权体系下,限制排放创造了一种以前并不存在的稀缺性,使得排放许可权成为一种有价值的资产。这种租金创造容易导致寻租行为的出现。和碳税相比,碳交易的主要优势则在于在政治上比较容易接受。在一个可交易排放权体制下,排放价值(污染排放数量乘以价格)的大部分很可能会以免费配额的形式给与被规制的产业。而把排放的价值分配给污染者:一方面会使相关的立法更可能被通过。因为相比税收,这种方法使立法者对分配结果有更大的控制力、使排放削减更确定并且减少了被规制产业承担的遵从成本。另一方面,则会改进立法的设计并有助于保证其可持续。在可交易排放权制度下,企业会寻求有利于自己的配额分配,这不会影响减排的成本有效性。免费的配额分配通过在被规制的产业内部创造一批受益者,也有助于维持对可交易排放权政策的政治支持(Keohane, 2009)。

虽然碳税和碳交易各有其优劣性,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如果对它们进行恰当的设计,其差异可能不会很大,两种工具的共性实际大于个性(Stavin, 2011)。从这两种工具的实际应用情况来看,目前也没有哪种工具占有明显优势。因此,在碳减排问题上,选择哪种工具作为减排的手段可能不如对选择的工具进行恰当的设计更重要(Goulder, 2009; Weisbach, 2010)。

## 《经济评论》简介

《经济评论》是由教育部主管、武汉大学主办的经济学术期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人。自1980年创刊以来，本刊立足于中国经济实践，瞄准当代世界经济理论前沿，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现代化、本土化和规范化。本刊设有中国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研究、经济理论探索、理论前沿动态、新书评介等栏目，发表经济学领域各类学术规范、方法现代、研究深入且具原创性的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

《经济评论》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CSSCI来源期刊。近年来，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要求和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态势，《经济评论》适时调整和更新研究主题，强调现代经济学新的研究方法，大力扶持青年才俊；另一方面，全面落实双向匿名审稿制度，进一步加大了与国际学术刊物规范接轨的力度，不断提升《经济评论》的学术质量和学术品位。

据中国知网统计，本刊的机构用户分布在27个国家和地区，如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个人读者分布在28个国家和地区。每年都有大量论文被《新华文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各种期刊等众多报刊文摘转载和转摘。

根据最新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8)，全国经济学理论核心期刊文献计量学评价中，《经济评论》排名第4；根据最新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在全国综合性经济学专业期刊的文献计量学评价中，《经济评论》位居第5。

作者可以进入本刊网站(<http://jer.whu.edu.cn>)网上投稿审稿系统在线投稿。根据相关提示操作，即可完成注册、投稿。完成投稿后，还可以通过“作者中心”在线查询稿件处理状态。本刊不收取版面费、审稿费等任何费用。

---

主管：教育部

主办：武汉大学

编辑出版：《经济评论》编辑部

简报责任编辑：杨丽艳

联系电话：027-68754563

E-mail: whujer@163.com

---